

论翻译文体学视域下典籍英译的 文体选择与翻译策略

黄海翔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2)

[摘 要] 典籍英译译者翻译的过程其实就是进行文体选择的过程。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 采用相应的翻译把自己的信息意图通过文体选择传达给译语读者。译者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译语读者基于译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译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与原语读者基于原作者的文体选择进行逆证推理所获得的关于原作者信息意图的一系列设想是否一致。如果译者不仅保留了原作者的信息意图, 而且其文体选择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文体选择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 其译文即可被认为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关键词] 文体选择; 翻译策略; 逆证推理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6639(2013)04-0063-07

一、问题的提出

文体, 简言之, 即可感知的有特色的表达方式^[1]。芬兰语言学家 Enkvist 指出: 文体即选择, 即在可供选择的表达中做出选择。换言之, 即以最有效的方式说出正确的话^[2]。翻译文体是译者基于美学或主题而做出的选择, “翻译文体学”隶属于文学批评范畴^[3]。典籍翻译的性质决定了典籍翻译须经过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4]。相比较而言, 语内翻译所涉及的原语与译入语之间主要是时间上的差距, 而语际翻译, 除了时间上的差距外, 还要面对不同空间或文化语境中所使用的不同的语言^[5]。面对时空的差距, 译者如何基于诠释的历史性对文体做出选择? 选什么与怎么选是横亘在译者面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二、文体翻译的研究方法: 基于传统与文化的思考

译者作为典籍的读者, 首先面对的原文本的表述乃是原作者选择的结果; 其次, 译者作为目标文本的创作者, 其译文表述又是其自身选择的结果。其中的关键是: 被译者感知到的原文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是“如何传递到译文中, 亦或经过了怎样的改变在译文中表达出来, 亦或在何种程度上被或能够被保留在译文中”^[6]。西方学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可追溯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所著的《诗学》。其后罗马作家关于文体的观点部分基于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和文艺美学理论。对于这些罗马作家而言, 翻译极为重要, 他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其后的作家, 尤其在字对字翻译和意对意翻译的区分上^[7]。西塞罗和贺拉斯认为原文的文体和效果很重要, 对如何在翻译中予以保留给予了高度关注^[8]。对文体翻译的研究亦肇始于《诗学》的文艺学和语言学理论, 这一研究自 20 世纪 60 年代起日益受到重视, 其具体研究方法表现为结构主义语言学 (及后来的早期转换生成语法) 的方法和文艺批评的细读法。结构主义语言学着重于以最详细的方式识别和分类语料, 而转换生成

[收稿日期] 2013-09-07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孙子兵法》英译的文化研究 (1905-2008)” (项目编号 09YJC740029) 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海翔 (1972-), 男, 华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语法则认为以结构主义的方式对个体语言的语料进行分类并以源于这些语料的潜在规律性的归纳法为解释方法尚不足以解释语言。转换生成语法关注人的意识以及语言如何反映意识。它提出了普遍的认知原则,目的在于以演绎法解释语料如何从这些原则中推论出来。转换生成语法关注的是作为语言解释源泉的意识,在这一点上与结构主义语言学不同,但两种方法与基于文本的文艺批评都共享了一个共同特征,即对语言的形式特征是重要的理解是一致的^[9]。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语言具有文化传递性。就翻译活动来说,语言这个载体可以分为天然载体和人工载体两种。A语言承载A文化时,A语言是天然载体,完全胜任。翻译中当A语言转换为B语言,由B语言来承载A文化时,B语言就是A文化的人工载体,此时B语言就不能完全胜任,只能说B语言能在宏观上承载A语言文本的文化,而在微观上就会在结构、语义和语用方面产生空缺或部分对等的情况。宏观文化是文本整体内容所反映的文化以及它根植于其中的某个民族的特定的社会文化。微观文化就是蕴含在语言各层面的文化因素^[10]。雅各布森指出:语言符号的物质实体与语言符号的能指属性截然不可分割^[11]。翻译,在严格的意义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对于文学性文本而言是不可能的,但创造性置换是可能的,因为认知经验是共通的^[12]。传统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认为,语言具有任意性,而通过强调语言的文艺美学功能,雅各布森与持语言具有任意性观点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家划清了界限。的确,具有文艺美学功能的语言是非任意性的,受制于蕴涵着言外之意的音调模式,有时深奥且可有多种解释,因此在功能上不仅不同于非文学语言而且也不同于非韵文语言^[13]。汉字诚如雅各布森所言,汉语就不具备任意性的特点。汉字属于形象表意文字,同表音文字有本质的区别。汉字通过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用丰富多变的符号形象组合式,共同的特点是以形象提示意义,它们的基本性质则是以感性的形象思维激发理性的概念思维。这就跟拼音文字有截然不同的区别,后者只是用简单的语音符号来激发概念思维,中间没有形象思维所需要的审美感性来加以“嵌合”。同时,声调赋予汉语特有的审美感性,声调的音乐性是它的本质特征。汉语声高变化的形式和幅度显示出调值的抑扬顿挫来,产生了汉语语音特有的音乐性^[14]。以《孙子兵法》为例,其虽然是一部兵学经典,却把汉语的形美、意美、音美发挥到了极致,在文学上取得了巨大成就。正是其不朽的文学价值使《孙

子兵法》跨越了古今中外的浩瀚时空,至今仍给人以深刻的启迪^[15]。然而这种文学性的表述方式却对译者提出了挑战,正如褚良才所指出的,体现在被誉为“东方兵学鼻祖”之《孙子兵法》,虽然全书几无难僻字,然而其中许多军事术语蕴意丰富,使后人“累世不能通,当年不得究”^[16]。这在英译中表现为翻译的历史性。艾克西拉指出,翻译最突出而又不用质疑的特征便是它的“历史性”^[17]。历史性不同于历史,历史以时间的居先性为依据;历史性则是对先前存在物(包括观念、精神等)所具有的客观性给予的肯定^[18]。这种历史性不从属于翻译的特性,而是作为用文字固定下来的文本或多或少地都要经过时间的推移才能得到阅读与理解^[19]。就《孙子兵法》的英译而言,翻译的历史性决定了译者在置换其功能与内涵时,须将其作为文化专有项来处理。

综上所述,笔者要追问的是:英语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的,而汉语语言符号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是非任意的。以英语来译汉语典籍时,典籍文本中可感知的有特色的表达方式该采用何种恰当的翻译策略才能在宏观文化层面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文的文体特征,同时在微观文化层面又能最大限度地传达出原文的文化内涵?

三、文体翻译策略: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

对文体翻译策略的思考,据谭载喜考证,始见于捷克翻译理论家波波维奇(Popović)。他界定文体对等为原文与译文成分的功能对等,目的是用相同意义的不变量达到表达上的一致。波波维奇还将这种类型的对等称为“充分性”(adequacy)、“表达对应”(expression correspondence)和“忠实原文”。这样,文体对等就涉及保存源文本成分的表达特征,同时还尽可能地保存其基本语义内容。然而,即使无法建立直接语义对应,译者也应当选择与源文本特定成分在文体上对等的目标语项^[20]。就此而言,典籍英译的文体翻译策略涉及对原作文体的理解与表达和译作文体的构建,其核心依然是文体选择,因为此时英语作为人工载体来承载汉语典籍文化时,必然在文体的结构和语义上产生空缺和部分对等。此时译者面临两个问题:其一,选择以何种结构和语义来表达出对原作文体的理解?其二,采取何种语用策略把所选择的结构和语义恰当地结合起来达到与原作文体的表达对应?其中不容忽视的难点是:译者所面对的原文文体并非静止的孤立的对象,而是原作者动态

选择的结果,即“受原作者致力于表达某一特定观点的承诺的驱使而做出的一系列选择”,在此意义上,“是文体而非内容体现出意义”^[21]。但译者同时又面临着对原作者所做出的选择如何把握和诠释的问题,因为既然典籍翻译包括语内翻译与语际翻译两类翻译过程,则译者首先须将典籍原本由古汉语译成现代汉语,再由现代汉语译成英语。但实际情况是,绝少有译者能身兼两任,即便以汉语为母语的中文专业人士,不经过长期的专业训练,想要直接读懂典籍原本也非常困难。故明智的方法是以译者认同的该典籍的某一权威注释本或现代汉语译本进行翻译。综观当世影响最大的一些典籍译本,莫不如此。在此情况下,典籍翻译的译者主体由语内翻译的译者(注家或现代汉语译者)和语际翻译的译者共同组成^[22]。故语际翻译的译者一开始就置身于感知原文有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的文体选择的过程中。语际翻译的译者之所以能够选择出与源文本特定成分在文体上对等的目标语项,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variability)、协商性(negotiability)和顺应性(adaptability)。语言的变异性指“语言具有一系列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语言的协商性指“语言的选择不是机械地或按照严格的规则或固定的形式—功能关系作出,而是基于高度灵活的原则和策略来完成”;语言的顺应性指“语言使用者能够从可供选择的多种可能性解释中基于语言的协商性作出选择,从而尽量满足交际的需要”^[23]。基于此,就典籍文体翻译而言,我们必须思考的是:语际翻译的译者面临着哪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译者是基于何种原则和策略完成选择?译者以他所认为恰当的方式做出了符合交际需要的选择是为了要达到何种交际目的?这一交际目的如何界定?

从宏观层面来看,根据波波维奇充分性、表达对应和忠实原文的观点,这一交际目的无疑是由原作者来决定的,即原作者致力于表达的某一特定观点。用语用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原作者通过语言表达的意图,即语旨。语旨通过语义来表达,而语义又蕴含在语言结构即语形中。语际翻译的译者必然要在传达原作意图的基础上构建译作文体。那么,译者采用何种语用原则和策略在可供选择的语义和语形中做出恰当的选择来传达出原作的语旨便是关键。因为在原作的理解过程中,语义和语旨是通过语形体现出来的,由语形,而语义,而语旨。而传达过程与理解过程恰恰相反,在翻译的传达过程中,权重最

大的是语旨,其次分别是语义和语形^[24]。基于此,我们不难发现:可供译者采用的语用原则和策略不止一个,但无论采用何种语用原则和策略,都须以传达原作的意图为依归。在以原作意图为依归的语用原则和策略指导下,典籍英译译者通过选择恰当的语义和语形来达到与原文的文体顺应。

基于此,我们可以把原作者的意图概括为两个方面:原作者的信息意图与原作者的交际意图。信息意图是指原作者让一系列设想显现或更加显现给原文读者的意图,交际意图是指把原作者的信息意图互相显现给交际双方的意图,其中信息意图是第一性的,交际意图是次要的信息意图,是第二性的。信息意图改变原文读者的认知环境,而交际意图在于让交际能够进行。这里的显现指“能够被感知或被推理”^[25]。信息意图体现了原作者的语旨所在,而交际意图则体现了原作者采用何种原则和策略选择恰当的语义和语形来达到这一语旨。译者必须忠实地再现原作者的意图,再现信息意图是第一位的,即主要是再现原作者对原语读者所做的设想;再现交际意图是第二位的,即再现互显原作者信息意图的方式,必要时译者可以根据受众期待调整交际意图,但必须尽量使译者的交际意图接近原作者的交际意图^[26]。由此可知,翻译是一种双重交际活动。一方面,译者要以读者的身份与原作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取决于译者本人有关目标文化的世界知识和经验是否达到或最大限度地达到原作者的理想读者的水平,另一方面,译者又要充当作者,与译文读者进行交际,这一过程的交际能否成功,则取决于译者对他的译文读者的先有知识和经验的预测是否准确,这一预测直接影响到他在实际翻译交际中的策略选择^[27]。故译者经历了双重交际活动,首先是作为原作者意向中的读者与原作者进行的交际行为;其次是作为译者与意向中的译文读者进行的交际行为。我们称前者为原语语内交际行为,后者为译语语内交际活动^[28]。意向性是交际的本质特征^[29]。作为译者,这个时候必须忠实的不仅仅是原作者,还有原作者意向中的受众,也就是说,必须忠实于整个原交际行为。至此,我们认为,忠实的翻译就是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翻译,即译者必须做到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30]。

四、逆证推理: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有效手段

设想是信息。其中,事实、作为事实陈述的不确定的设想、错误设想都可作为信息处理。参见: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M]. Oxford: Blackwell, 1995.

译语交际行为忠实于原语交际行为的原则有效解决了文体翻译中如何达到“充分性”、“表达对应”和“忠实原文”的问题,从语用上使忠实这一伦理要求具有了可操作性。那么,采取什么样的策略来实现这一原则便是文体翻译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关联理论认为:明示和推理是一个交际过程的两个方面。明示是指说话人的交际行为,推理是指听话人为了识别说话人的信息意图所发生的交际行为。所谓明示行为,就是交际者通过交际意图把自己的信息意图显现给交际双方,成功的交际在于受众对信息意图的识别^[31]。翻译同样是明示—推理交际,但是,与其他交际不同的是,翻译交际包含了两个明示—推理交际活动。因此,忠实原交际就是不但要做到忠实意图,即忠实明示的方式,而且还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的推理方式。在翻译的两个明示—推理交际中,原作者和译者都是通过交际意图把信息意图告诉他们各自的读者,因此,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对译者来说,必须做到采取和原作者一样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也就是同样的显现设想、互显设想的方式。归根结底,要保证原作者对原语读者的设想内容不变;同时,原语读者和译语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要做到忠实原交际翻译,译者必须做到让译语读者的推理方式和原语读者一样,关键是让他们在识别信息意图时的推理距离相等,即保持原语读者对系列设想中的设想的可及度(accessibility)不变。即忠实翻译必须能够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让译语读者能够与原语读者一样在识别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时具有同等的推理空间。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意图的稳定性让译者在翻译时找到了稳定的忠实参照物,原作者信息意图中的系列设想则为再现原作者的信息意图提供了参数”^[32]。

刘宓庆指出,原语作者对原语读者是有期待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期待性的作品^[33]。我们认为,只要是一个负责任的译者,就会担当起原作者意向读者的角色,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同时,作为译文的作者,也要以有效的翻译策略把原作者的信息意图传达给译文的意向读者,让译文读者能够以同样的推理方式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如何判断译者的翻译策略是有效的呢?既然原文读者和译文读者都是依靠推理来获得原作者的信息意图,那么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我们完全可以通过逆证推理的方式判断作为原文意向读者的译者所采取的翻译策略是否以最有效的方式做出了选择,从而传达出原作者的信息意图。

逆证推理(abduction)由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他用这个名称与归纳法和演绎法区别开来,但没有进一步详细论述,后来也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20世纪初,由于美国哲学家皮尔斯、汉森等人的提倡,逆证推理才逐渐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各种边缘科学中获得广泛应用。逆证推理把观察语句看做待说明项,把科学假说看作说明项,认为推理是从待说明项到说明项的逆行。皮尔斯和汉森把它表述为这样的推理形式:(1)某一意外的现象P被观察到;(2)若假说H为真,则P理所当然是可以说明的;(3)因此,有理由认为H是真的。逆证推理实质上是从事有待解释的事实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然后发明并选择最佳假说,使之从这个最佳的假说及背景知识和前提条件中,逻辑地演绎出待解释的事实^[34]。故逆证推理是从一需要解释之观察到的现象形成一解释性假设的推理过程^[35],而且是寻求最佳解释的推理过程^[36]。皮尔斯把逆证推理、演绎法与归纳法这三种基本的推理形式分为两个范畴:解释性(explicative)推理和扩充性(ampliative)推理。解释性推理指从前提必然能推出结论,结论解释前提;扩充性推理指从前提不能必然推出结论,结论扩充了前提^[37]。故逆证推理属于扩充性推理。推理作为一种思维形式,不是先天的,也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客观事物之间的一定关系在人们意识中的反映,是在人们社会实践的基础上,适应着人们实践活动的需要和认识的发展而产生、形成起来的^[38]。故推理与人们的认知环境和背景知识是密不可分的,逆证推理亦不例外,逆证推理体现的是“介于观察、解释和背景知识之间的三重关系”^[39]。诚如美国学者Kapitan所言,某一现象令人吃惊这一声明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一现象参照于背景知识而言,已然超出了基于背景知识所能做出的期望之外^[40]。推理人所做出的假设其实是其认知语境的反映。语境是一个心理架构,是听话人关于外部世界的假设的一个次类。正是这些假设,而不是外部世界的真实状态,左右着人们对话语的解釋^[41]。基于此,笔者认为,译者做出的文体选择本质上也是基于译者本人的背景知识所做出的选择。那么,译者是如何基于自己的背景知识做出选择的呢?译者采用了何种翻译策略把他所理解的原作者信息意图中所包含的系列设想显现给译文读者呢?下面,笔者以当代美国著名汉学家Mair教授和著名翻译家林茂荪先生的英译《孙子兵法》为例,从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角度,以逆证推理为言语理解与表达的思维形式,以译文读者在识别原作者信息意图时是否与原语读者具有同

等的推理空间为依据,对两位译者文体翻译的客观效果进行分析。

译者如要对原作者做出的文体选择进行解释,他所要做的如只是从他的背景知识中提取出可行的假设,那么他所做的推理即为选择性逆证。作为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如果我们对于译者信息意图和原作者信息意图中包含的设想所做的推理具有相同的推理空间,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笔者认为,就典籍英译而言,无论是译者还是具有交互文化背景的译文读者,就诠释的历史性而言,他的背景知识应包括语内翻译译者的诠释在内。Mair译本即写明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的《宋本十一家注孙子》影印本为底本(以下简称《十一家注》)。例如:

(1)赏罚孰明? (《孙子兵法·计篇》)

(1a) which command is more impartial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42]

(1b) Which side is more transparent in dispens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s^[43]?

两译差别在于一个“明”字,这是作者显现信息意图的中心所在。林译用意译,Mair用直译。根据(1a),我们可以做以下设想:

(a) which command is more objective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b) which command is neutral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 which command is unbiased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d) which command is disinterested in meting out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而根据(1b),我们可以做以下设想:

(a) Which side does not try to keep anything secret in dispens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b) Which side is allowing you to see the truth easily in dispens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c) Which side makes dispensing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easy to understand?

(d) Which side makes rewards and punishments more obvious?

那么,语内翻译的译者对“明”字是如何逆证推理的呢?查《十一家注》,杜牧曰:赏不僭,罚不滥。杜佑曰:赏善罚恶,知谁分明者。故王子曰:赏无度,则费而无恩;罚无度,则戮而无威。梅尧臣曰:赏有功,罚有罪。王皙曰:孰能赏必当功,罚必称情?张预曰:当赏者,虽仇怨必禄;当罚者,虽父子不舍。又,司马法曰

“赏不逾时,罚不迁列”,于谁为明^[44]?我们可以发现,诸位语内翻译译者的逆证假设基本是一致的:明者,严明公正也。林译选 impartial 来译在再现原作者对其意向读者所做出的设想方面要比 Mair 选 transparent 来译要好,它给予了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一样的推理空间,因而更忠实。而 Mair 之译虽然不错,却把译语读者的推理空间无形之中延长了。再如:

(2)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芟秆一石,当吾二十石。(《孙子兵法·作战篇》)

(2a) Therefore, a wise general does his best to feed his troops on the enemy's grain, for one zhong (tr.: 1,000 litres) of grain obtained from enemy territory is equivalent to 20 zhong shipped from home country, and one dan (tr.: 60 kilos) of fodder from enemy territory to 20 dan from home^[45].

(2b) Therefore, the wise general strives to eat the enemy's food. Eating one bushel of the enemy's grain is equal to bringing twenty bushels of our own. A picul of the enemy's fodder is equal to twenty of our own^[46].

两译者对于文化特色词“钟”、“石”的翻译策略不同。林译用音译加文内注,Mair用意译。如何评价这种不同?以往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莫衷一是。但如以原作者信息意图为基准,思路便豁然开朗。根据(2a)对“钟”的诠释,我们可以做以下设想:

(a) Zhong is a culture-specific item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b) Zhong is a unit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ancient China.

(c) If converted to the metric system, one zhong is equal to one thousand litres.

根据(2b)对“钟”的诠释,我们可以做以下设想:

(a) Bushel is a culture-specific item in the U.S. and Britain.

(b) Bushel is a unit of weights and measures in the British and U.S. system.

(c) If converted to the metric system, one bushel is equal to 35.238 litres in the U.S. system.

我们发现,两译者文体选择所依据的背景知识不同。查《十一家注》,曹操曰:六斛四斗为钟。杜牧曰:六石四斗为一钟^[47]。据《现代汉语词典》:斛,旧量器,口小,底大,容量本为十斗,后来改为五斗。石,容量单位,10斗等于1石。斗,容量单位,10升为1斗,10斗为1石^[48]。根据曹操和杜牧的考证,1钟等于640升。但值得注意的是,两译者均没有选择曹注和杜注为诠释之依据。林译选择当代著名注家郭化若

将军之注为翻译之理据。郭注曰:钟,春秋时容量单位。齐国分奴隶主、公室的“公量”同新兴地主阶级的“家量”两种。公量一钟为六百四十升;家量一钟为一千升^[49]。林译基本保留了原交际设想,反观 Mair 译文,则未能保留原交际设想。结合全句来看,虽然 Mair 译文未能保留原作者设想和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但其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其实更为接近。因为毕竟林译加了文内注,缩短了译语读者的推理空间,更关键的是,译语读者会以为该文内注是 zhong 的唯一解释,从而易形成先入为主的概念。“石”的英译策略亦是如此。林译同样是用音译加文内注,而 Mair 用意译。两译者文体选择所依据的背景知识是一致的。查《十一家注》,曹操曰:石者,一百二十斤也。杜牧曰:一石,一百二十斤。张预曰:一百二十斤为石^[50]。据《英汉大词典》,picul 意为“担(中国和东南亚地区使用的重量单位;133.33 磅)”。1 磅=0.454 公斤,one picul=60.53 公斤^[51]。Mair 此译可称佳译,它不但保留了原作者的交际设想,也保留了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使得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又如:

(3)卒未亲附而罚之则不服,不服则难用也;卒已亲附而罚不行,则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孙子兵法·行军篇》)

(3a)If you punish soldiers for not being devoted to you, they will remain disobedient; and if they are disobedient, they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But even when you have their devotion, if discipline is not enforced, you still cannot use them. Hence, 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humanely and keep them in line with strict military discipline. This will ensure their allegiance^[52].

(3b)If one punishes his troops before he has gained their fealty, they will not submit to him, and if they do not submit it will be difficult to use them in battle; if one has already gained the fealty of troops but does not carry out appropriate punishments, he cannot use them in battle either. Therefore, I cultivate my soldiers with civility and treat them even-handedly according to military regulations. Hence I will be sure to achieve my goal^[53].

在“令之以文”之“文”的翻译上,两译者出现了重大差异。根据林译,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treating them kindly……

(b)……you must win them over by caring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ir lives and trying to be kind to them……

而根据 Mair 译文,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

(a)……I try to get support from my soldiers with polite behavior……

(b)……I try to develop a friendship with my soldiers with courtesy in order to get an advantage from it……

就“文”的英译而言,两译者同样用意译,但 Mair 却出现了误译。因为译文读者根据 Mair 英译所做出的逆证假设与原作者的交际设想明显不符。查《十一家注》,诸语内翻译译者的逆证假设如下:曹操曰:文,仁也;武,法也。李筌曰:文,仁恩;武,威罚。杜牧曰:晏子举司马穰苴,文能附众,武能威敌也。王皙曰:吴起云:“总文武者,军之将;兼刚柔者,兵之事也”^[54]。很明显,此处“文”绝非 polite behavior、courtesy 之意。Mair 之译无论在保留原交际设想还是保留原语读者推理距离上均归于失败。而林译不仅成功地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故其译是忠实于原交际的翻译。

五、结语

典籍英译的文体选择实际上是译者基于自身的背景知识和语内翻译译者的历史性诠释把一系列交际设想显示给译语读者的过程,这一系列设想是译者信息意图的体现,可能是事实,也可能是当做事实陈述的不确定的设想乃至错误的设想。译者采取何种翻译策略、选择何种有特色的表达方式把这一系列设想显示出来取决于译者对原语交际设想的逆证推理。如果译者的翻译不但保留了原交际设想,而且给译语读者的推理距离与原作者给原语读者的推理距离基本一致或接近,我们就认为,译者的翻译是忠实于原交际行为的翻译。

[参考文献]

- [1] Wales, K. A Dictionary of Stylistics [M]. London: Longman, 2001. p37.
- [2] 王守元. 英语文体学要略 [M].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0. p11.
- [3] Chan, Tak-hung Leo. Readers, Reading and Reception of Translated Fiction in Chinese: Novel Encounters [M]. Manchester & Kinderhook (NY): St. Jerome Publishing, 2010. p178.
- [4] [22] 黄海翔. 从语内翻译到语际翻译: 典籍翻译译者主体性之辨 [J].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8(3): p144.
- [5] [19] 许钧. 翻译论 [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3. p121~125.
- [6] [9] [13] [21] Boase-Beier, J. Stylistic 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11. p5, p7~8, p13, p21.
- [7] Bassnet, S.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Methuen, 1991. p43.
- [8] Qvale, P. From St. Jerome to Hypertext: Transla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 [M]. Manchester: St. Jerome, 1998. p9.
- [10] 周志培, 陈运香. 文化学与翻译 [M].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p6~11.
- [11] Bradford, R. Roman Jakobson: Life, Language, Art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3.
- [12]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A]. Venuti, L.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C]. London: Routledge, 2000. p118.
- [14] 刘宓庆. 新编汉英对比与翻译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6. p2~14.
- [15] 傅朝. 《孙子兵法》的文学价值 [J]. 辽宁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1(3): p80.
- [16] 褚良才. 孙子兵法应用与研究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2. p412.
- [17] Aixelá, J.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ranslation [A]. Álvarez, R. & Vidal, M. Carmen-África. Translation, Power, Subversion [C].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7. p58.
- [18] 张思洁. 翻译的哲学过程论 [J]. 外语教学, 2007(3): p133.
- [20] [英] 沙特尔沃思, 考伊. 翻译研究词典 [M]. 谭载喜, 主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5. p218.
- [23] Verschueren, J.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ing Press, 2000. p58~63.
- [24] 赵彦春. 翻译学归结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p10.
- [25] [26] [28] [30] [32] 王建国. 关联理论与翻译研究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9. p5, p39, p40, p43, p45~46.
- [27] 王东风. 文化缺省与翻译补偿 [A]. 郭建中. 文化与翻译 [C].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99. p249.
- [29] [31] [41] Sperber, D. & Wilson, D.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M]. Oxford: Blackwell, 1995. p64, p54, p15.
- [33] 刘宓庆. 翻译与语言哲学 [M]. 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p80.
- [34] [38] 彭漪涟. 逻辑学大辞典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 p572, p338.
- [35] Peirce, C.S.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M]. Harstshopne, C., Weiss, P., & Burks, A. (ed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引自第5卷, 第171段.
- [36] Harman, G. The inference to the best explanation [J]. Philosophical Review, 1965(74): p88~95.
- [37] [39] Hu Jian. Abductive Reasoning and Speech Comprehension [M]. Hefe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Press, 2012. p20, p41.
- [40] Kapitan, T. Peirce and the autonomy of abductive reasoning [J]. Erkenntnis, 1992(37): p7.
- [42] [45] [52] [春秋] 孙武. 孙子兵法 (大中华文库) [M]. 吴如嵩, 吴显林, 校释. 林茂荪, 英译.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07. p5, p15, p69.
- [43] [46] [53] Mair, V.H. The Art of War: Sun Zi's Military Method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2007. p78, p82, p112.
- [44] [47] [50] [54] 杨丙安. 十一家注孙子校理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 [48] 晁继周主编. 现代汉语词典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8.
- [49] 郭化若. 孙子译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p18.
- [51] 陆谷孙主编. 英汉大词典 [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下转第62页)

- [21][明]胡广.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p338~339.
- [22][明]焦竑.玉堂丛语[M].元明史料笔记丛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1.p146.
- [23][26][33][37][39][明]黄佐.翰林记[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p1,p2,p5~6,p18,p3.
- [24][明]申时行.大明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p1096.
- [25][28][29][34][35][36][40][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p1787,p1788,p1786,p3784,p40,p4018,p1786.
- [27][明]孙继宗.英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p3382.
- [31][清]钦定历代职官表[M].文渊阁四库全书(60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p441.
- [32][清]龙文彬.明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6.p634.
- [38][明]郑晓.今言[M].元明史料笔记丛刊[Z].北京:中华书局,1984.p41.
- [41][明]杨士奇.宣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3.p436~437.
- [4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p10.

The Construction and Historical Function of the Imperia Academy in the Ming Dynasty

Chen Yanchao

(Yanch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angfang Hebei 065201, China)

Abstract: The Imperia Academy which was built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gradually added the function of editing history in the Song Dynasty. Since it was set up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numbers and obligations of the officials in the Imperia Academy had changed many times. There was no professional compilation institu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the Imperia Academy undertook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diting history, which strengthened its historical function. The Imperia Academy in the Ming Dynasty not only appointed the special official historiographer, but also organized the activities of editing history in the historical bureau, which obtained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achievements, and had far-reaching influences.

Key words: Ming Dynasty; the Imperial Academy; construction; historical function; strengthening; influence

(上接第 69 页)

On the Choice of Style and Translation Strategy in the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Tran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al Style

Huang Haixi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42, China)

Abstract: While the translator is engaged in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al works, he is actually involved in the reasoning process of making the stylistic choice. Based on his background knowledge, the translator should adopt appropriat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nd convey his informative intention to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by means of the choice of style. However,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he translator should apply. What matters most is whether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can infer the set of assumptions intended to make manifest to the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by the author from the translator's choice of style in accordance with abductive reasoning. If the translator not only retains the author's informative intention but also makes the choice of style in his translation which could keep an equal inferential dist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readers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s in pursuit of the author's informative intention, his translation will be regarded as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communication as a whole.

Key words: the choice of style; translation strategy; abductive reasoning